

重构我国经济学学科体系的设想与建议

■ 银川大学商学院 张卫 田广

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将近四十年,其间所取得的成就斐然,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远远超过了日本。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为什么会在这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答案非常简单明了,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这些理论和框架又反过来对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由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超强解释力和科学指导力,使得中国特

殊的经济学,在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提炼出一系列新概念、新规律、新范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框架,这些理论和框架又反过来对实践产生了巨大指导作用。由于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超强解释力和科学指导力,使得中国特

我国经济学学科发展现状 & 反思

在改革开放的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以追求数量和规模为目标,这在经济起飞、快速摆脱贫困阶段的确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国借鉴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学领域进行了许多富有效益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促进了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就学科本身发展而言,在高校中开设了相关的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及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相关课程。然而,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逐渐被淡化、边缘化;更有甚者,一些高校居然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使得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门课程。曾经一个时期,西方发达国家极力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一对良经济



学科产生了相当大影响。导致中国经济学几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于侧重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理论的学习。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专家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产权改革。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占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流地位。他们一致创指国有经济体系,认为国有企业产权代表的缺失,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从而主张基于经济转型的条件,国有企业民营化才是唯一出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经过深入思考,我们认为由于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曾经确实落后,为快速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我们不惜全方位学习西方经济学,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误认为西方经济学可以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学术领域西化倾向严重。西化发展的结果,不仅大大削弱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落后,不适合当下中国的情况,而且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方法上,重定量分析轻定性分析。

定量分析方法一般用数学语言进行描述,依据统计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并用数学模型计算出分析对象的各项指标及其数值。虽然定量分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可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

结论。然而,不可否定的是过于重视定量分析,从某种意义上使经济学研究失去了思想性。而定性分析方法一般用文字语言进行了相关描述,主要凭分析者的直觉、经验,凭分析对象过去和现在的延续状况及最新的信息资料,对分析对象的性质、特点、发展变化规律进行抽象,并做出判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该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

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提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在新常态下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调结构、去产能、补短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于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6%—7%的合理区间就可以了。基于目前的经济形势,国家领导构建发展出来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是基于中国这片经济土壤而成长出来的,是中国特

殊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最大特点。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入细致地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全方位地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等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需要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再次站在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面临许多复杂而艰巨新问题;当前,农村土地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工作,还处于试点阶段,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后所产生的“非粮化”倾向问题,工商企业进入农村的资格审查制度问题,承包地、宅基地和宅基地上农民自建房屋能否用于抵押的问题,新兴产业布局与产业存量调整问题,如何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第三产业发展与劳动力素质提高问题,如何更加有效分配国民财富问题等等,都需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深入研究,做出科学回答。

此外,当前中国人力资源的流动数量和流动速度为世界所罕见,因此研究农村与城市之

间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的城镇化除了遇到同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类似的问题之外,还有中国特殊的问题,即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比如说,农民工进城后,虽已工作多年,但农民户籍未变,身份仍然是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社会,不能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因此,中国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但又必须分阶段推进。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这就是中国

的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由此演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理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能沿用他国的一些方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找到符合中国情况的规律,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办法,总结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结论,构造起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科学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特征,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基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指导,且将此作为中国

经济学学科发展的最大特点。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以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为主攻方向,深入细致地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体制、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全方位地研究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等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为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

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

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

是一个系统的体系建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重视基础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应该注重对高校经济学专业的系统建设。作为经济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内容,为重构中国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实践,并在理论上升华,从而建设和发展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此同时要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第二,正确处理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与此同时要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史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处理好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基于目前定量研究泛滥的情况,更要重视质性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推广,尤其要关注经济人类学、市场营销人类学,大数据时代下的计量营销学的研究与发展。这些跨学科的边缘学科,必将对未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经济学与数学、物理、生物等其他自然科学的关系,要特别关注大数据、计算机及其他工具在经济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应用,关注互联网+所带来的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发展的跨学科建设。

第四,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经济学主要涉及四个分支学科:经济学基础理论;部门经济学;经济史学;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同时,必须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释力。

第五,在教材的编写上选择、运用上,注意理论和实际案例的结合。经济学是一门反映社会现实经济生活的学科,需要随社会经济发

“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学神话

■ 张五常

一、回顾“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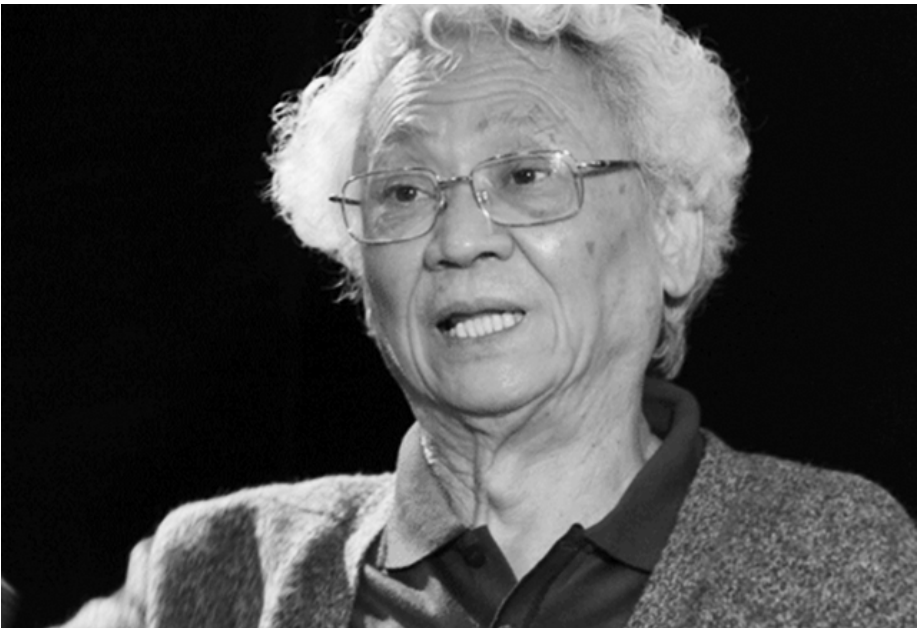
“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又称为“格雷欣法则”,是根据16世纪的英国铸造局长格雷欣(Thomas Gresham)的名字命名的。他发现市场上一些由于长期流通而磨损,导致重量不足(成色不足)的贵金属货币在流通,而“足金”的货币则被收藏,或熔化成金属块,甚至转运出口到国外去。过了300年后,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劳德(MacLeod)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时,把这种“劣币驱逐良币”(Bad money drives good money out of circulation)的现象确认为经济学上的一条定律,并根据格雷欣的名字命名为“格雷欣定律”(Gresham's Law)。这种现象上升为一条定律,就是由此而起。

二、唐肃宗的“乾元重宝”

唐肃宗铸造“乾元重宝”的背景,与历史上一切政府意图搞通货膨胀瞒天过海解决财政困难的背景如出一辙。且说唐玄宗后期,由于生活奢侈,后来又爆发了安禄山的叛乱,导致军费开支浩大。他死后,唐肃宗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第五琦(“第五”是一个复姓)的建议下,通过铸造大钱来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以其年号“乾元”而史称“乾元重宝”。这是历史上最早称“重宝”的钱,顾名思义就是重量特别大的货币,但其实在兑换比率上是不足称的,开启了后人不断以铸造“重宝”来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恶例。

“乾元重宝”重5.97克,一文当开元通宝钱十文。然而开元通宝重3.98克,按理说重量的对比是合理的兑换比率,一文“乾元重宝”应该只值大约1.5文开元通宝,官方却竟然规定值10文,无怪乎唐肃宗的诏书公然声称:“冀实三官元资,用收十倍之利”。唐肃宗铸造“乾元重宝”获利甚丰后,食髓知味,才刚过一年又铸“重轮乾元重宝”,进一步把重量增至11.94克,但即使是如此之重,也不过是开元通宝的三倍左右,却当开元钱五十,可谓变本加厉。

据正史的记载,如此疯狂地发行虽重而仍



不足称的大钱,直接引起的后果有三:其一自然是通货膨胀:“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饿死者相枕于道”。其二是上行下效,民间出现了严重的盗铸情况:“长安城中,竟为盗铸”,甚至寺庙的钟、铜佛都被熔化了去铸铸这重不符实、因而利润奇高的重宝。其三是最重要的,出现了所谓实钱和虚钱的双重价格。也就是说,如果以足称的开元通宝(良币)支付,价格较低(实钱);如果以不足称的乾元重宝支付,价格较高(虚钱)。由此产生了两种物价:“缘人民钱价不定,人间抬加价钱为虚钱。”

从史书之记载可见,当时虽然确实是经由民间盗铸而使流通领域内涌现了大量的“劣币”(乾元重宝及其盗铸钱),但“良币”(开元通宝)并没有因此而真的被排挤驱逐以至消失,而是通过“双轨价格”的出现而使二者得以共存。事实上,虽然官府最初的时候致力于打击民间盗铸,但最后也迫于经济规律的强大压力,一方面降低了“乾元重宝”兑换开元通宝时过分高估的价格(宣布重轮钱由当开元钱50文改为30文),另一方面认可了双重物价并存

的合法地位。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私铸币(劣币)泛滥的现象,民间交易中其实早就存在着虚、实钱的问题。但好钱(良币)加抬,在其他时期,从来没有得到过官方认可。唐朝的好钱价却得到官府认同,合法化了——唐肃宗“上元元年六月七日报:‘其重轮五十价钱,宜减作三十文行用;其开元旧钱,宜一钱十文行用;乾元当十钱,宜依前行用’……至十二月二十九日报:‘应典贴庄宅、店铺、田地、碾等,先为实钱典贴者,令还以实钱价;先以虚钱典贴者,令以虚钱赎。其余交关,并依前用当十钱。’由是有虚实之称。”由此,诏文认可了民间业已存在的虚钱交易,允许同时存在虚钱买卖和实钱买卖两种交易方式。这说明虚钱交易在上元年间因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而得以合法化。

三、经济学中的神话

“劣币驱逐良币”的神话在逻辑上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考虑到支付货币一方(买

方)的精明(劣币付出去,良币收起来),却完全忽视了收取货币一方(卖方)也不是笨蛋(劣币不肯收,除非加价;良币乐于收,甚至愿意减价)。除非信息不对称的解决之道,所谓劣币驱逐良币最多只能是昙花一现。而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往往是“买的不如卖的精”,这可不仅仅是针对出售的产品,即使是对货币的识别能力也往往是如此。否则不要说劣币,假币岂不早就大行其道,把真币都淘汰出局了?

然而,“劣币驱逐良币”甚至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比喻,用于形容一切劣质品淘汰了优质品的情形。有些人更把这个定律与“柠檬市场”理论扯到一起,说在信息不对称之下劣质的二手车把优质的二手车淘汰出局也是这个定律的明证。姑且不论柠檬市场理论在逻辑上与“劣币驱逐良币”完全不同(柠檬市场上的买方虽然所知少于卖方,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所知少于卖方,于是采取开清楚市场中等质量二手车的价格的方法来保护自己——与“劣币驱逐良币”中假设的卖方完全是一个傻乎乎的大笨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样才导致了劣质二手车驱逐优质二手车的现象发生),而在现实之中,又岂会真的出现优质二手车完全被排斥驱逐的现象?人们早就为解决这个问题发明了多种制度,以确保优质二手车车主的利益,从而使二手车交易市场之兴旺发达从来不在新车市场之下。

“劣币驱逐良币”的神话并不是经济学上唯一直到今天仍大行其道的神话,但这个神话很有代表性,差不多可以说是涵盖了经济学上诸多曾经出现,甚至到现在还流传甚广的神话的多个特点。

其一,所谓事实其实只是以讹传讹。据曾获诺贝尔奖的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J.R. Hicks)所言,“劣币驱逐良币”的定律不过是一个传言,却在岁月的流传之中越传越盛。类似这样的神话,还有那大名鼎鼎的吉芬(Giffen)物品,也是因为吉芬爵士提到过,就以他命名了,于是可能只是一个猜想的提出就以讹传讹成了事实的提出。不过,吉芬物品至少在某种

逻辑上还是可以成立,但实证从来无法证明过,于是载入了教科书。相比之下,“劣币驱逐良币”的神话只是长期流行于民间,甚至更多是作为一种比喻而流传。

其二,神话之所以成立的逻辑,往往是缘于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劣币驱逐良币”的所谓定律,只见货币支付者的精明,却把货币收取者当成傻瓜,不仅仅是把信息不对称的困难看得太不可克服,更重要的是对竞争的本质没有认识。即使货币收取者是傻瓜,货币支付者之间的竞争也会把劣币的物价抬升而把良币的物价压低。

与之有点类似的另一个神话,是凯恩斯主义的“破窗理论”——小贼把一个店主的窗户打破,迫使他要花钱去买新的玻璃,于是增加了社会的消费,从而增加了生产玻璃的厂商的收入,又增加了玻璃厂商的消费,又增加了向玻璃厂商提供消费产品的厂商的收入……如此消费与收入交替地增加,整个社会的国民财富就增加了。后来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在一本小书里一针见血地戳破了这个神话:破窗理论只看到玻璃厂商的收入及其消费的增加,却没有看到那不幸的店主本来要把那笔钱用于其它消费、现在却不得不削减了这方面的消费,于是供应这些消费品的厂商的收入及其消费也交替地减少,使整个社会的国民财富减少了。我们其实不必烦恼于无法比较本来要消费的产品因被削减而导致的国民财富减少较多,还是被迫消费的玻璃带来的国民财富增加较多。因为撇去这些繁复的推理,一个以简御繁的思考方式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社会跟原来的社会相比,就是少了一块玻璃,这不是损失是什么?

神话的第三个特点,当然是明明是错得很简单也很明显,却仍然长久地被人们所相信。在此,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有必要携手合作。历史学家关于唐代实钱、虚钱的研究其实已经相当深入而细致,但他们往往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修养去理解这一段史实对反证“劣币驱逐良币”定律的重要性,而经济学家也因为对中国历史了解的有限反而只能满足于津津乐道那在传言中变得绘形绘色的英国历史。